第一章

怀将圣之心，遇不察之世

——关于荀子的生平事迹

姓氏的疑问——游学于齐——入秦的年份

——离齐之楚——复任兰陵令——三为祭酒

——稷下学宫创建年代、地址、教育特点

客问：先生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明确说你叫荀卿，注释说你名况。可是《战国策·楚策》、《韩非子·显学》、《汉书·艺文志》、《汉书·儒林传》、刘向《孙卿新书叙录》等书篇都作孙子、孙卿，就连你的著作《荀子》中的《儒效》、《议兵》、《强兵》、《尧问》等篇也多见孙卿子。请问：先生到底姓甚名谁？

答问：我的姓名因存在不同的记载而产生疑问，造成了一些相异的猜测。其一，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引》，在“荀卿，赵人”下谓：名况。时人相尊而号为卿也。仕齐为祭酒，仕楚为兰陵令。后亦谓之孙卿子者，避汉宣帝讳改也。”唐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孙卿”下注：本曰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他们提出了“避讳说”。

其二，清人谢墉作《荀子笺释》，在序言中批驳了“避讳说”，云：考汉宣名询，汉时尚不讳嫌名，且如后汉李恂，与荀淑、荀爽、荀悦、荀或具书本字。讵反于周时人名见于载籍者而改称之？若然，则《左传》自荀息至荀瑶多矣，何不改耶？且即《前汉书》任敖、公孙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骜也。”这一批驳是很有力的。再说，询、荀不同，即使避讳，书写时也不改字。谢墉进一步说：盖荀音同孙，语遂移易，如荆轲在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又如张良为韩信都，《潜夫论》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胜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则荀之为孙，正如此

比。”《荀子集解·考证上》)这种意见可以称之为“同音通假说”。

其三,清人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说:“郇卿之为郇伯之后,以国为氏,无可疑矣。且郇卿赵人,古郇国在今山西猗氏县境。其地于战国正属赵,故为赵人。又称孙者,盖郇伯公孙之后,以孙为氏也。王符《潜夫论·志姓氏》篇云‘王孙氏、公孙氏,国自有之孙氏者,或王孙之班,或公孙之班也。是各国公孙之后,皆有孙氏矣。由是言之,郇也孙也,皆氏也。战国之末,宗法废绝,姓氏混一,故人有两姓并称者实皆古之氏也。”胡氏在列举了陈完可称田完的例子后继续说:“孙氏各国皆有,不明所出,后人宜称郇以著所出,故郇卿书称孙子,仍之不改,郇子自称之辞也。自太史公称荀卿,其后裔荀淑等皆曰荀,相沿至今,皆曰郇子,故不复称孙也。”(《荀子集解·考证下》)胡氏的主张可以理解为“孙荀同姓说”,而且认为我本为孙氏,荀是后起的,荀当为郇。

现在该由我来说明自己的姓氏问题了。胡氏认为荀、孙与郇邑有关,是有道理的。可他认为战国时以荀来区别各国的孙氏(包括郇邑的公孙氏),却是错误的。史载周文王第十七子封于郇邑为郇侯,而郇邑本来是黄帝后裔荀氏的居地,为了区别地名、姓氏,便出现了郇、荀二字。郇侯之子孙可以产生公孙氏,可是到了春秋前期,晋武公吞并了郇邑,不再允许郇侯的子孙称公孙氏或孙氏,因为晋国国君的子孙才有资格称公孙氏或孙氏,于是郇侯的后裔就按照黄帝以来的旧传统以荀氏行世了。春秋时代的荀氏是晋国的大家族,有不少知名人物,见于《左传》记载的就有荀林父、荀偃、荀息、荀瑶、荀寅等,至春秋后期,荀氏在晋国内部的倾轧中失败了,部分成员依附赵氏,赵、魏、韩三家分晋后,

郇邑属魏地，荀氏便迁到赵国。胡氏说郇邑于战国时属赵国,也是错误的。战国时代的荀氏虽属小康,但不能与春秋时代的荀氏同日而语，世人自然就不了解荀氏的情况。战国时代虽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术空气活跃,但没有认真、严密的历史学家。幸亏在西汉出现了优秀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在为我写传记时掌握了别人和后人无法了解的材料,《史记》说我姓荀,是对的。清人谢墉认为荀、孙同音通假,也是对的。当时文字未统一,形、音、义相似而通假的情况普遍存在。荀、孙不仅有相同的韵母 un,而且声母 x、s 也难以分清,容易相混。而且可能由于荀氏的衰落,而齐国孙氏的兴盛，人们为了表示敬意，就称我孙卿或孙卿子了。

至于我的名字况、卿问题,仅作如下说明。我国在称呼问题上有这样的习惯：名，一般是自称的或供尊长称呼的；字,一般是供别人称呼的,称字含有尊敬的意思,如果直呼其名,就是不敬,所以在取名起字时很讲究。《左传》桓公六年说取名时“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我的长辈都是知书识礼的,不会以“卿”这样的字眼作为我的名字的,我自己也不会这样做：“况”是长辈赐予的名。我的字是什么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卿”是战国开始流行的对他人的尊称,人们也如此称呼我,久而久之,就成了我的名字。刘向《孙卿叙录》说：“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正指此意。清人王引之的《春秋名字解诂》、胡元仪的《郇卿别传考异》等考证,都忽视了如下的事实：“卿”是我的长辈赐予的名字,还是别人对我的称呼？有了以上这些说明，就可以明白我的姓氏名字了 姓荀,名况。他人则称我荀卿、孙卿、孙卿子,也可

称孙况。

客问：在明白了先生的姓氏名字以后，对先生的生卒年及年寿尚不甚清楚。先秦和秦汉的书籍无一提到先生的生卒年，于是造成近代学者的多种考证和推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把你游齐的年龄定为 50 岁，在公元前 265一前 260 年间，故可推出生年为公元前 315一前 310 年间，并说你卒于公元前 230 年左右 梁启超《荀卿及〈荀子〉》假定你的生卒年为公元前 308—前 213 年(《古史辨》第 4 册)；郭志坤则定为公元前 315一前 217年(《荀学论稿》)。请问先生：你究竟生于哪年？卒于何岁？

答问：说实在，我的生卒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因为先秦和秦汉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人们并不重视爵里生卒的问题，即使《春秋》和《左传》记了一些要人的卒年，但很少记生年。以上这些考证和推算所根据的材料都比较简略，但由于他们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力，推算的生年相差无几；虽然卒年差别大些，但他们推导的共同结论是荀子的年寿甚高。我的寿命确实很长，可由于年老昏聩，我记不得死于哪一年，大凡一个人也不会记得自己的死期，而有一点是记得的，那就是我的弟子李斯在秦始皇时拜相，弃仁义而专权势，完全背叛了我的教诲，我遂为之不食而死。《盐铁论·毁学》说“：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为之不食。’当时我已年迈，哪里还经得住‘ 不食 ’的打击呢 总之，要想知道我确切的生卒年，有待于记有这一内容的文物出土，否则就只能是推测。以上几种推算，郭志坤所定者近得其实。冯友兰说：“ 荀子的生卒年不可考；然其一生之重要活动则大约在此六十年中也。 ”（指公元前 298—前 238

年,《中国哲学史》)这是很机智的。我想,既然人们认为我是个思想家,似乎应以了解我的思想体系为主,而不必拘泥于我的生卒年。

客问:感谢先生的教导。不过,有关先生游学齐国的年龄,似乎比生卒年重要,而其说法也不一致。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年 15,始来游学于齐";刘向的《孙卿新书叙录》一文也认为先生 50 岁才去齐国游学。阮应劭《风俗通义·穷通》说:"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游学。"请问先生,游齐的时间是 50 岁,还是 15 岁?

答问:对此问题,胡适先生也怀疑过,他说:"年五十始来游学,这个'始'字含有来迟的意思。若是'年十五'决不必用'始'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实,我的游学与游宦、游说的概念有所不同。根据《尔雅·释诂》的解释:"初,始也",这就是说,我是在 15 岁的时候,初到齐国来读书,若是 50 岁才来齐国读书,那未免太迟了。钱穆先生对我游齐时间作了详尽的考证,他认定司马迁和刘向所谓"年五十",实为"年十五之伪",当时在抄写中,文字颠倒,又失校对,所造成的差错是常有的。我确是 15 岁游学齐国的,钱穆先生在《荀卿考》中提出了三条根据是言之有理的。不妨引录如下,以正谬传。

其一,"曰游学是特来从学于稷下诸先生而不名一师者,非五十以后成为师之事也。"

其二:"曰'有秀才',此年少英俊之称,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名也。"

其三:"曰'始来游学',此对以后之最为老师而言,谓荀卿之始来尚年幼为从学,而其后最为老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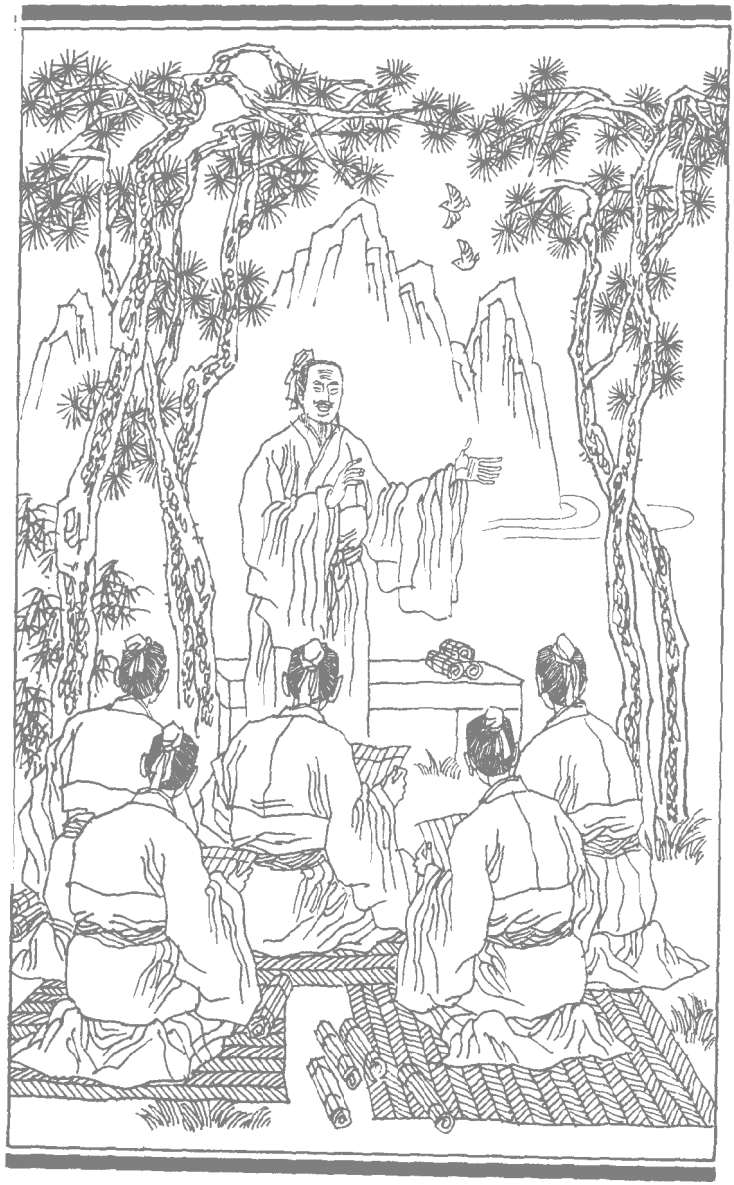
钱穆还指出“:荀卿于闵王末年去齐,至襄王时复来,则始来者又对以后之一再重来而言也。据此，则荀卿之齐，其为十五之年明矣。”(《古史辨》第 4 册）

客问：先生曾经到过秦国，同秦昭王、丞相范雎讨论过儒家思想、儒者和治国方略等重大问题。刘向《孙卿新书叙录》把此事列在最后，似乎是先生一生中最后一件事。清人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指出 此事‘ 不出秦昭王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也。”(公元前 253一前 251 年,《荀子集解 · 考证下》)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在公元前 260 至前 255 年。钱穆《荀卿考》则定在秦昭王四十一至五十二的十二年间(公元前 266 至前 255 年,《古史辨》第四册)。请问 先生究竟在哪一年入秦的 ？

答问：我入秦的年份倒是比较确定的。确定这一年份，有以下几个历史事件值得介绍给各位。

第一,1975 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战国末期至秦代的十二座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简，其中有一种《编年记》。它记载 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 255 年),“ 王稽、张禄死 ”(《睡虎地秦墓竹简》)。张禄即范雎。范雎系魏国人，曾被怀疑私通齐国，差一点送命，遂化名张禄，逃至秦国。既已明确范雎卒于是年，则我于公元前 255 年以后入秦的年份完全可以排除，亦即胡元仪之说显误。

第二，秦赵长平之战发生在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 260 年）。这次战争非常残酷，秦将白起坑杀赵降兵四十万人。我是赵国人，不可能在此年以后入秦，入秦也不可能不抗议此战。我同秦昭王的讨论，有人作了记录，后来整理成《儒效》篇而编入《荀子》 我同范雎讨论的内容,即为《荀子 ·



最为老师

强国》。这两篇文章没有一点抗议秦坑杀赵兵的痕迹。因此可以确定我入秦的年份在公元前 260 年以前。胡适所定年份亦误。其实，秦军侵赵，赵将廉颇屯兵长平，两军对峙并陆续发生战争,始于公元前 262 年，所以我入秦也不可能晚于此年。

第三,齐襄王卒于公元前 265 年,齐国动乱,稷下学者纷纷逃离齐国，我即于此年入秦。夏甄陶已经注意到以上三事,说"荀子入秦的确切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 264 年左右，因为这时齐襄王正好死了，而荀子是很受齐襄王尊宠的。秦国利用这个机会聘请荀子入秦,可能性较大。"(《论荀子的哲学思想》)郭志坤则把此事定在公元前 266 年(《荀学论稿》),出入不大,因为我有可能早一年离齐入秦。

客问 我们都知道先生在齐国曾"三为祭酒"而"最为老师"。后来先生还劝说齐相要"爱民"、"好士"，据《史记》记载，齐相国没有接受先生的正确意见，反而听信谗言，先生在不得意的情况下离开齐国而到楚国去，此事在先生一生的经历中相当重要。能否请先生介绍一下齐国的情况和先生的处境？亦即先生本来比较得宠，后来怎么变得非离开齐国不可了？

答问：让我先来讲述当时的情况吧。燕昭王二十七年(前 285 年),为了报复 30 年前齐国攻取全燕、残杀燕民的仇恨,命乐毅为将,进攻齐国。楚国、赵国、魏国也派遣军队参战，秦国于是年攻取齐国九座城市。第二年，燕国攻取了齐国的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齐湣王出逃被杀,齐国处于危亡之中。除了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两城外,燕国和楚、赵、魏联军攻占了齐国其余所有

的国土和城市。此时，齐国出了个著名人物田单。他本来只是一个地方上管理市场的小官吏,逃到即墨后,就积极组织力量抗击燕军,利用离间燕王与乐毅的关系,用火牛阵打败了燕军,收复了国土。这场战争整整打了七年,战争使齐国元气大伤 。齐襄王于公元前 283 年在莒继位。《史记》说田骈、邹衍等皆死齐襄王时，正指在这场战争中去世。

齐国复国后,致力于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发展经济建设,颇有生气。许多失散的学者也纷纷回到稷下,稷下学宫又出现了往日的生机。不过,不少前辈学者已经去世,大家推举我当祭酒,都尊我为老师。此时,我认为齐国有可能恢复往日的威风,而且对田单也充满了希望,所以以强国之术进说田单。现在看来,当时的我未免书生气太足了,也太理想化了，因为齐国内部的政治情况并不允许田单施展才华，田单的政治才能也不如他的军事才干。以下数事将有益于大家对此问题的认识。

首先,齐王建身边有一群妒贤嫉能的谗臣,经常离间齐王和田单的关系，甚至说田单阴怀取代齐王的异志。齐襄王在位不久就去世了，由太子建即位。年轻的齐王建既受制于其母君王后,又经常听信谗言。《战国策·齐策六》说：“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属,欲伤安平君,相与语于王曰：‘且安平君之与王也,君臣无礼,而上下无别。且其志欲不善。内牧百姓,循抚其心,振穷补不足,布德于民,外怀戎狄、天下之贤士，阴结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为也。愿王之察之。’”本来‘振穷补不足,布德于民’是恢复国力的必要措施,可是出于谗臣之口,却成了阴怀异志的罪状,逼使田单不得不‘免冠徒跣肉袒而进,退而请死罪’。后来虽然齐王建释疑而益封田单以万邑,杀死了一群谗臣,而事实上已经

挫伤了田单的政治热情。当然，此时的田单可能已经年迈，无振兴国家的能力了。

其次，同齐襄王患难与共的君王后在襄王去世后掌握了实权，虽然史称贤者，但她不可能有振兴国家和一统天下的大志和能力。有一个既能说明此情况，又饶有趣味的故事，值得介绍给大家“：君王后事秦谨，与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秦昭王曾经派使者送给君王后一件叫做玉连环的礼物，曰‘齐多知，而解此环不？’君王后让群臣来解，群臣竟然没有人能解者。“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秦昭王送玉连环的礼物，隐含联结齐国和寡妇君王后的双重意义，作为女性的君王后当然十分敏感，所以“引椎椎破之”，表示自己的决心。后来君王后年老病死，临死前告诫齐王建‘群臣之可用者某”；可惜已经讲不清话了，及准备了笔要她写下时，她却已经忘了（《战国策·齐策六》）。这则故事虽然同我遭谗离齐没有直接的关系，却反映了君王后的实际权力和威望。

最后，我作为祭酒，作为老师，仅仅表示在学者中得到尊敬，齐国统治者对我也是尊敬的，但谈不上得宠，更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和权力。象田单这样立有殊功异勋、贵为相国的人，照样会遭到谗臣的伤害，更何况我呢？所以，一旦我进说强国之术，其矛头又直指那一帮谗臣，他们自然会群起而攻击的。《强国》篇保留了我进说齐相的内容，篇幅虽长，但正好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故摘引于后：

> 处胜人之执，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执，不以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执，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然则得胜人之执者，其不如胜人之道远矣。夫主相者，胜人以执也，是为是，非为

非,能为能,不能为不能,并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今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相国之于胜人之执,亶有之矣。然则胡不驱此胜人之执,赴胜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 如是,则国孰敢不为义矣 君臣上下,贵贱长少,至于庶人,莫不为义,则天下孰不欲合义矣 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相国舍是而不为,案直为是世俗之所以为,则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国乎？

显然，那次进说相国的内容很不利于君王后和那帮谗臣的，“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他们怎么会不奋起反击呢？我不得不离开齐国。当局者迷，而对于以上情况,我在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因此说我书生气太足,太理想主义了。

客问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刘向《孙卿新书叙录》等文献的记载，先生在齐国遭到谗臣的攻击后，便离开齐国,到了楚国,楚相春申君黄歇封先生为兰陵令。不久又遭到谗言,罢官。后又有人建议黄歇要重用先生,于是复为兰陵令。可是钱穆《荀卿考》却说:“后世言荀卿事,悉本司马迁、刘向。然向言最难凭,既曰孙卿后孟子百余年,又谓其与孙膑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其无稽如此。《史记》于卿事亦疏略不备。余既别为考之，而于春申君封荀卿为兰陵令一事,则不能无疑 盖其说始于马迁,成于刘向,实未足为信史也。”(《古史辨》第 4 册）请问先生：你在楚国任兰陵令究竟

是真是假？

答问 确有其事。由于钱穆认定《强国》篇所载我说齐相事发生在齐湣王时，文中的齐相为孟尝君田文。于是他怀疑我反复任兰陵令的事，他怀疑的是“反复”。是时间，如果读完钱穆的《荀卿考·春申君封荀卿为兰陵令辨》，你就会发现他是肯定我任兰陵令这一事实的。不过，我还得说一说那个“反复”的过程。

在解答上一个问题时已经明白了《强国》篇所记说齐相事，系发生在齐王建时，齐相乃是田单。进说的主张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了谗臣的攻击，我不得不离齐适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史记·春申君列传》则说得更明白：“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司马迁的两处记载是一致的，我初任兰陵令的时间为春申君为相 8 年（前 255 年），这年正当齐王建十年。司马迁没有提及我在楚国遭谗的事，那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曲折。

我任兰陵令而出现反复，皆因春申君的食客所进谗言而起。《战国策·楚策四》说：“客说春申君曰：‘汤以亳，武王以镐，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今孙子，天下贤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势，臣窃以为不便于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谢孙子。孙子去之赵，赵以为上卿。”这显然是我初任兰陵令时，政绩始见，那帮子食客感到不安，妒忌了，于是进谗言。那些食客常在春申君身边周旋，春申君对他们是有感情的。春申君又是一位没有远大理想、不太好的政治家，于是听信了谗言。过了不久，客又向春申君进谏：“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夫

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国未尝不荣也。今孙子,听信天下贤人也。君何辞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使人请孙子于赵。《战国策》的这些记载说明春申君是一个没有决断的人,当断不断,反受其害,为他日后被李园所杀的事件作了铺垫。所以说,这些记载也同时说明了我任兰陵令有反复的事实。我复任兰陵令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春申君,以表示感谢。所谓感谢,实际上是要他明辨是非,明察秋毫。这封信较长,也保存在《战国策·楚策四》中,仅引其中的赋于此:

> 宝珍隋珠,不知佩兮。袘布与丝,不知异。阎妹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

《战国策》说'孙子为书谢曰',谢'在文言文中,通常既有感谢的意思,又有责备的意思,在这首赋中,人们也可以看到我对春申君的责备和告诫。

现在要分析《战国策》这些记载的可疑点和可信之处。说它可信,是因为它客观地提到我反复为兰陵令的事,而且这些记载同时见于《韩诗外传》卷 4。《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系经战国末、秦而入汉的学者,在汉文帝时任《诗经》博士。其写成《韩诗外传》在刘向编定《战国策》前,而且其所录我写给春申君的信,字句多有不同,可见其另有所本。这样,我任兰陵令有反复的事就不是孤证了。说《战国策》往往有夸诞之词,文中'赵以为上卿'便是。若赵任我为上卿,我为什么还要去任兰陵令呢?那又为什么我已届老年,还热衷于当官呢?我既已形成政治思想体系,当然希望有实践它的愿望。再说兰陵对于楚国来说,是一个战略要地,兰陵令实际上是重要职务。

客问 先生既已提及‘ 祭酒 ”,并认为自己虽为祭酒,但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和权力。由于《史记》没有写明祭酒是不是官职，是掌管什么事务的，因此我们不明白祭酒究为何物。后来注释《史记》的学者中唯唐代的司马贞说过‘: 礼食必先祭，饮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当祭耳，后因以为官名，故吴王濞为刘氏祭酒是也。而卿三为祭酒者，谓荀卿出入前后三度处列大夫康庄之位，而皆为其所尊，故云‘ 三为祭酒 ’ 也。’可是事至今日,我们对司马贞的注释也不太理解了。在当今学者中出现两种意见：其一认为祭酒就是当时学会首领的头衔，到汉代以后才被正式列于学官（《稷下学概述》,《齐鲁学刊》 1983 年第 1 期）;其二认为祭酒是居官的学术领袖，否则就不至于发生“ 齐人或谗荀卿 ” 的事了（《论稷下学宫的性质》,《齐鲁学刊》 1983 年第 1 期）。故想请教先生：祭酒究竟为何物？

答问：司马贞的解释其实不错，只是在语序上有误，会使人产生刘濞为祭酒就是官名的误解。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根据礼仪的规定，凡进食、饮酒都得先祭神。饮酒时的主祭者即为祭酒，一般由尊长者担任此角色。稷下学宫是齐国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具有很悠久的历史，夏商时代已经有学校了。周代在都城设置的学校称序，供王公贵族的子弟读书，可以俗称为大学。在郊外也设学校，称乡校。当时各邦国学校设置的情况也基本如此，比如鲁国的学校叫泮宫,郑国有‘ 子产不毁乡校 ’的故事,有乡校，则证明有都城内的学校。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官学也随之废置，于是有孔子倡导私学的事迹。稷下学宫在齐国都城的郊外，可能是原来乡校的遗址。经战国齐宣王的提倡

和支持，稷下之学繁荣起来了。齐国政府向到稷下学习和讲学的人提供住所、食物、车辆和其他费用。作为一所学校,当然应该有一定的礼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规章制度和纪律；也需要有人掌管学校的各种事务。《礼记·射义》云:"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射,是当时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既练习射艺,又举行射礼来选拔人才。而饮酒之礼对于教育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当时稷下学宫的学者仍然实行"食必先祭"的礼仪,所以,稷下学宫的各种事务中除了教学以外,主持祭酒礼仪也是主事者的重要事务,于是就把稷下学宫的主事者称为"祭酒"。而稷下学宫的主事者往往由公认的尊长者担任。综上所述，祭酒含有三层意思：年长者，即最为老师、受尊崇的学者,犹今言学术领袖;稷下学宫的主事者,大约相当于校长。

祭酒是否在政府机构居官？我没有在齐国国家机构中担任过什么官职,也不能干预政事。不过,稷下学宫培养的人才倒是可以在齐国或其他国家担任要职的。

客问：既已提及稷下学宫，关于稷下学宫由谁创立的，我看到一些文献的记载有所不同,刘向《别录》说:"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18 引。《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集解、索引引《别录》语,无"西"字)曹魏徐幹《中论·亡国篇》说:"齐桓公立稷下学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士而尊宠之。"请问先生:稷下学宫究竟是齐桓公(齐威王之父)创立的,还是齐宣王创立的？

答问：前面已提到过先秦时代学校设置的概况。各邦国都在都城内或都城附近设立学校,齐国的学校称‘学宫”,由于在都城的稷门外的稷山脚下，故称“稷下学宫”。按照当时一般学校设置的制度而言，稷下学宫应该是早已有之的事。可是随着姜齐政权的衰落，稷下学宫也坏废了。战国时代的齐国，其政权实际上已落到了田氏的手中。姜姓的齐康公在位十四年(前 391 年)时,被田和强行迁至海上。周安王十六年(前 386 年）正式承认田氏代齐。齐桓公田和便是正式的田齐政权的第一个国王，故又称太公。恢复稷下学宫，招致人才，成了新兴的地主阶级田氏政权的重大政事。所谓恢复，实际上是重建，也可以说是创立。稷下学宫要有知名度，需要一个过程和一定的时间。所以《中论·亡国篇》说齐桓公立稷下学宫，是以它在田齐政权时开始重建而言的。其他书上说稷下之学为齐威王、宣王时事，是指它的繁荣、兴旺而言的。田齐国家共得桓公、威王、宣王、湣王、襄王、王建六位国王,公元前 221 年灭于秦。田齐的六位国王都比较重视教育，稷下学宫的成功，与国家的重视是分不开的。稷下学宫的成功，在当时就得到人们的称赞，在其坏废以后,汉初的博士叔孙通还以‘稷嗣君’为号,秦汉之际的博士多被称为“稷下生”，以表怀念和继承稷下学风之意。稷下学宫的成功，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客问 唐司马贞作《史记索引》,于《田敬仲完世家》下谓‘:《齐地记》曰:‘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堂,址往往存焉。’盖因侧系水出,故曰稷门,古侧、稷音相近耳。又虞喜曰:‘齐有稷山,立馆其下,以待游士。’亦异说也。《春秋传》曰:‘莒子如齐,盟于稷门。’’而于《孟子荀卿列传》下曰‘: